

在河泊所遗址读懂西南边疆“从多元到一体”

新华社记者 伍晓阳 严勇

自古民族众多、曾建立古滇国的西南边疆，在西汉设置益州郡、实行郡县制后，是如何融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的？近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云南河泊所遗址，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发掘揭开了益州郡都治的面貌，出土了大量两汉时期的简牍、封泥和建筑遗迹等。考古学界认为，这些重大发现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研究秦汉之际西南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价值。

体现和平包容的“双城记”

“近年来，河泊所遗址发掘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介绍，“新的考古发现确认，河泊所遗址是古滇国都邑和益州郡都治。两座城池比邻而居，上演了一段‘双城记’。”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是从商周延续到汉晋的大型聚落遗址、古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

记者近日探访河泊所遗址，考古人员正在几个探方内开展发掘和清理工作。这是一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古时候台地与河道交错分布，确实是人类栖息和筑城的理想之地。

发掘现场往北约一公里，便是石寨山古墓群。1956年，考古人员在石寨山遗址清理一座大墓时，发现一枚金质“滇王之印”。

这个重要发现，揭开了尘封2000多年的古滇国神秘面纱，石寨山古墓群被认定为古滇国族墓地。

《史记》中简要记载了古滇国的情况，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后来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

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说：“古滇国本身没有文字，但出土了数万件青铜器，留下了丰富的‘无字天书’。”曾经创造辉煌青铜文明的古滇国后续发展如何？古滇国的都邑到底在哪？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考古学界。

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有助于揭开这些谜团。

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西部发现了密集的居住区、祭祀区和手工业区，出土了“滇国相印”封泥和大量古滇文明遗存，被认定为古滇国都邑。河泊所遗址东部发现了大型建筑遗迹、宽达12米的道路、水井和灰坑等丰富遗迹，特别是去年发现了从汉代延续到魏晋的城墙，以及“益州”铭文瓦当，证明这里就是2000多年前的益州郡都治。

考古学界认为，河泊所遗址的“双城记”，表明汉武帝设置益州郡时，没有对古滇国取而代之，而是在它旁边建了一座“新城”。这一做法既保留了古滇国的文化基因，又展现出中央王朝营建新城、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是中华文明和平性、包容性的生动体现。

大量简牍封泥见证汉代边疆治理

河泊所遗址另一项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和封泥，堪称汉代边疆治理的文献档案库。

“目前已发现简牍5万多枚，其中有字简牍1.4万余枚，保守估计不少于10万字。”蒋志龙说，这些简牍出土于多个点位，主要是灰坑和水井中，推测为文书资料销毁场所。

“河泊所遗址汉代简牍的出土，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简牍学家、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评价。这批简牍内容丰富，包括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书信和典籍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简牍中发现了西汉、东汉12位皇帝年号，从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到建安二十

年（公元215年），年代跨度近300年，表明两汉中央王朝对云南实行了长期有效治理。简牍中发现了“滇国”“滇廷”“滇相”等记载，显示古滇国和益州郡同时存续了一个时期，而且中央王朝派遣了官员协助滇王治理滇国事务。

此外，“滇池以亭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的简牍题记表明，益州郡建立了联通内外的邮亭传递网络。记载《论语》的简牍表明儒家思想在汉代已在西南边疆传播。户籍简牍则证明汉朝已在益州郡实行编户齐民的制度，实现了社会治理的进步。

与简牍同步出土的还有大量封泥。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已发现2000多枚封泥，主要出土于河道边缘的灰烬堆积中，大部分是官印封泥，还有私印封泥、道教封泥、无字封泥等。

在石寨山考古工作站，记者见到了这批珍贵的简牍和封泥。考古队员谢霍敏介绍，与古滇国和益州郡有关的封泥有“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说明汉朝在益州郡采取了“郡国并行”的双重治理体制。

官印封泥中与上级有关的封泥有“益州刺史”等，与周边有关的封泥有蜀郡、犍为、广汉、永昌、交趾等郡太守章，与属县有关的有滇池、建伶、双柏等20个县的官印封泥，显示益州郡与上下内外的公文往来非常紧密。

私印封泥涉及大量人名，印文既有张、王、李、赵、宋、高、陈等常见的汉姓，还有诸如“雕序”等疑似少数民族汉语姓名，这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直接体现。

印证中华文明在边疆的演进特质

河泊所遗址考古研究的丰富成果，不仅勾勒出古城的轮廓，更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在边疆演进的特质。

——揭示了益州郡郡治面貌，实证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长期有效行使治权。蒋志龙介绍，考古发掘初步揭示了益州郡城址的

主体结构和功能分区，城址主体结构由外环壕、护墙、内壕、城墙四部分组成。城内有东西向主干道，道路两侧有大型官署建筑遗迹，还有房址、水井和灰坑等。

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郡县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樊海涛认为，设置益州郡都是一个里程碑事件。从益州郡设置开始，多民族聚居的云南开启了融入大一统国家的新阶段。

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陈伟认为，汉朝设益州郡后，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等系统地扩展到云南地区，开展有效治理，为开发西南边疆、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指出，就我国历史上边疆与内地的关系来说，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河泊所遗址考古的新发现，为西南边疆与中原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很好的考古实证。

——反映了西南边疆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王巍指出，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虽然有分有合、进程曲折，但从多元走向一体，国家统一始终是发展的主线。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完善了滇池盆地从商周到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是西南边疆从多民族地区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的考古实证。

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

目前，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积极推进，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整理、研究阐释等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界相信，将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华社昆明6月16日电）



“儒伊文明对话会” 聚焦文明交流互鉴

新华社记者 王嘉伟 程一恒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共同主办的“儒伊文明对话会”16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对话会主题为“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马两国近百名学者与会。

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孙春兰出席对话会并致辞表示，本次对话会既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生动实践，也是落实中马两国领导人共识的积极行动。她表示，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千百年的友好交往历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儒伊文明对话将为应对挑战提供人文智慧，为深化全球南方合作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注入积极能量。

马来西亚总理夫人旺·阿兹莎代表安瓦尔总理致辞说，期待通过开展儒伊文明对话积极化解潜在冲突，坚定秉持和平、自由、仁爱与公正的价值理念，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且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表示，中马两国是儒伊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典范，儒伊文明互鉴的智慧之光始终照亮中马民心相通之路，助推“冰火不断”的中马世代情谊接续传承、愈加深厚。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校长奥斯曼·巴卡尔表示，此次对话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期待今后同国际儒学联合会开展更多务实合作。

在学术交流环节，中马两国学者深入探讨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的共通之处，系统回顾“伊儒会通”“回儒对话”等历史经验，从不同视角探讨深入开展儒伊文明对话、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话题。

（新华社吉隆坡6月16日电）

科学家揭秘蚂蚁 在恐龙时代的组织架构

新华社记者 白瑜

北京时间16日晚，由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南昌大学、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科学家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联合发表研究成果，揭示了蚂蚁适应性辐射与社会性演化的遗传基础。

身长不足一厘米的蚂蚁，竟拥有足以令人类佩服的组织能力。它们不靠语言沟通，却能协同建造惊人巢穴；它们没有领袖意识，却有最严密的分工体系。联合研究团队通过整合全球163种不同蚂蚁的全基因组数据，重构了蚁科的生命之树，涵盖现生蚂蚁16个亚科中的12个，343个属中的97个。这项成果不仅澄清了蚁科物种复杂的亲缘关系，更是将蚂蚁的共同祖先追溯到约1.57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揭秘蚂蚁在恐龙时代的组织架构。

研究团队发现，在蚂蚁共同祖先的基因组中，与嗅觉感知相关的基因家族发生了显著扩增，表明蚂蚁的共同祖先已经具备社会通信的关键分子机制。不同种类的蚂蚁在调节“谁当蚁后、谁当工蚁”的过程中，这些信号通路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反映出它们在自然选择下的适应性演化。

文章共同第一作者、南昌大学教师熊子军介绍说：“以保幼激素和胰岛素信号为核心的保守通路在蚂蚁社会性演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蚂蚁中许多社会性状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共同塑造了蚂蚁表型的多样性。我们的研究从基因水平、基因家族、基因调控网络和保守信号通路等多维度揭示了驱动蚂蚁社会性演化的分子遗传基础。”

（新华社深圳6月16日电）



近日，江苏公安与检察机关披露两起跨国诈骗案——传统冒充公检法诈骗披上“验资审查”“优先调查”新外衣，针对海外学子实施精准围猎，伪造通缉令等话术操控留学生，并利用黄金交易、虚拟货币等新型洗钱手段转移资金，单案涉案金额高达200万元。

新华社发 王鹏作

葡萄牙中医师： “中医改变了我对生命与健康的理解”

新华社记者 范伟

斯在座谈会上分享道。

在中国的实习中，葡萄牙学员们深入中医内科门诊，学习针灸、推拿、艾灸等技术，参与中药处方的开具，全面了解中医诊疗体系如何运作。他们还参观了中医博物馆、中药制剂实验室、产后康复中心及药房，近距离感受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

“中医关注的是人的整体状态，从身体、情绪到心理层面，并针对不同个体有的放矢地进行治疗。”卡鲁若说，亲身前往中国这一中医发源地观察当地医生如何将理论应用于临床，这段经历“让我更有信心将中医理念应用到葡萄牙的临床中”。

葡萄牙是较早完成中医立法的欧洲国家之一，2024年葡萄牙将传统中医学纳入国家高等教育学位体系。

近年来，经过共同努力，中葡双方在中医药学科设置、学术研究、校际合作和人才培养、临床诊疗等领域已有了扎实的合作基础，不仅在大学间设立“传统医药学联合实验室”，还开设专门培养本土中医人才的培训学校。

“中医改变了我对生命与健康的理解。”刚刚结束中国实习的费莉帕·托马斯

得益于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民众基础，中医药在葡萄牙获得了较高的接受度和美誉度。据了解，目前葡萄牙全国有200余家中医诊所，年服务患者超过50万人次，针灸、推拿、中草药等疗法日益融入当地民众的健康生活选择。

受邀参加座谈会的里斯本中医学校校长若泽·法罗说，中医因具备较高性价比而深受患者欢迎，目前已成为葡萄牙医疗体系的重要补充。他希望未来两国加强信息化合作，推动中医智能化平台建设，为临床提供更好支持。

“我们希望未来能再次前往中国学习，继续精进中医技能。”卡鲁若和托马斯说。如今，像卡鲁若和托马斯这样的中医师正将中医理念推广给更多葡萄牙民众。中医已成为中葡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也为全球健康事业贡献着东方智慧。

（新华社里斯本6月18日电）

我国科学家绘制 青藏高原高精度草地植被图

新华社记者 张泉

6月17日举行的青藏高原草地植被图学术研讨会上，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王艳芬教授团队绘制的青藏高原草地植被群系图正式发布。这是目前我国精度最高的青藏高原草地植被图，精细刻画了65种植物群系或群系组的空间分布格局。

王艳芬介绍，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以草地为主体，属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近40年来，青藏高原草地植被发生明显变化，原有草地植被图已难以准确反映当前植物群落结构与功能。

此次发布的草地植被图比例尺为1:50万，绘制过程中，团队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效挖掘并融合了数万个野外调查样点、上百个遥感图层的多维信息，攻克了复杂高原环境下精准识别和分类的难题，清晰展现了基于群系的草地植物群落结构的空间特征。

据介绍，团队共识别出65种植物群系或群系组，其中高山嵩草草甸、紫花针茅草原、矮生嵩草草甸、垂穗披碱草草甸和线叶嵩草草甸5个群系分布最广。参加研讨会的多位专家表示，此草地植被图不仅精确描绘了植物群系的空间分布，还阐明了植物碳输入数量与质量对土壤碳库稳定性的影响，对更好开展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